

儒家文化对东亚一体化的双重影响^①

□王秋彬 著

摘 要：文化，特别是共同文化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是东亚地区的标志性文化，是该地区许多国家的文化源泉，是形成东亚意识的文化基础，是东亚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标签。儒家文化作为区域共同文化基础，是推进东亚一体化的重要条件，其中的和合、诚信、包容等思想亦有助于促进区域合作。但同时，作为一个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文化观念，儒家文化中也有许多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因素，例如儒家文化中的等级秩序、忠君爱国思想、耻感文化等，与该地区旨在建立平等、互利、互信的区域共同体目标相悖。因此，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对传统的儒家文化应当扬长避短，发挥其有利因素，避免其负面影响，使之更好地为区域一体化贡献精神力量。

关键词：儒家文化；东亚；一体化；共同文化

作者简介：王秋彬，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儒家文化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基于历史与地缘因素，它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模式、家庭伦理及人们的行为方式。尽管人们对儒家文化褒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问题争端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770047）阶段性成果。

贬不一,东亚文化本身也异彩纷呈,但谁都无法否认儒家文化是东亚最为重要的文化标签。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儒家文化具有双重作用。作为区域共同文化基础,儒家文化是推进一体化的重要条件,其中的和合、诚信、包容等思想亦有助于促进区域合作。但同时,作为一个形成于两千多年前农耕时代的文化观念,儒家文化中也有许多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因素,例如,儒家文化中的等级秩序、忠君爱国思想、耻感文化等,与该地区旨在建立平等、互利、互信的区域共同体目标相悖。

一 作为东亚共同文化基础的儒家文化

东亚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从地理范围上看,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从规模上看,东亚在世界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分量,东亚总人口约21.6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0%;面积为1616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0.8%。其中,东北亚人口约16亿,面积为1170万平方公里;东南亚人口约5.6亿,面积为446万平方公里。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也是多样性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在政治上,该地区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差极大,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与最低国家之间相差100倍;文化领域更是千差万别,儒家文化是该地区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文化,但由于历史原因,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该地区亦有极大的影响力。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其2.1亿人口中有90%是穆斯林。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全国有85%左右的人信奉天主教。菲律宾人的思想观念、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乃至国家的政治活动,均受到天主教神学观念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在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差别时曾指出:“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种种族的代表性的特点、文化类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纷繁杂陈,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人类所见识过的全部类型。”^①他的这一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

尽管东亚地区文化差异巨大,但从各种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儒家文化无疑是其中最大的一种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东亚的文化标签,是东亚与西方文明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志。儒家文化形成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从中国的秦汉到唐代,儒家文化逐渐传入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

^① [美]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亚洲及其前途》,辛耀文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它不仅迅速成为这些地区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到了7—8世纪的中国唐朝时期,东亚儒家文化圈基本形成。“东亚文化圈包括汉字、儒教、律令、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算学、阴阳学、天文、历算等)和中国佛教五个要素。”^①目前,儒家文化圈主要涵盖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人口再加上移居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华侨,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口大约有16.9亿人,占东亚地区人口总数的78%。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具有当之无愧的主导地位,为该地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共同文化基础。举例来说,“如果不是因为《论语》的内涵广泛影响东亚诸国,则东亚文化不可能普遍呈现讲究‘克己复礼’、‘修己安人’、‘孝悌忠信’、‘德化天下’等原则的集体思维”^②。

共同文化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欧洲一体化运动即是建立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Habermas)指出:“要把欧洲统一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作为持续扩大欧盟的理由,就不能离开大大超越经济范畴的文化凝聚力。”^③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东亚各国开启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建立起了“10+1”、“10+3”、东亚峰会等区域合作机制,尽管目前东亚存在诸多领土、领海及历史争端问题,但各国对区域一体化的追求一直没有放弃。儒家文化作为该地区的共同文化基础,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聚合作用。东亚各国文化上的亲缘性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东北亚,最大的问题是这一地区国家之间心灵的距离。但是这些国家具备了缩短距离、形成文化共同体的绝佳因素,那就是在悠久岁月里累积下来的共同的文化遗产。”^④共同文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如果成员间不具备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一致性(cultural unity),国家体系将不会产生”^⑤。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进一步指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⑥不可否认,欧洲一体化是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其发展模式

① [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② 江宜桦:《儒家思想与东亚公共哲学——以“和而不同”意旨之分析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③ [德]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读书》2002年第5期。

④ [韩]罗钟一:《东北亚共同体的文化视角》,朴键一等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⑤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3.

⑥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页。

很难被其他地区复制,但共同文化在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却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虽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东亚各国的儒家文化出现了一些差异,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圈内各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却是相同的。毕竟汉字作为正式文字在朝鲜半岛存在了1700多年;在日本也延续了1200年之久;早在西汉末年汉字就传入了越南,12世纪起汉字成为越南国家的正式文字;这些国家均以汉字为基础发展出了本国的文字。相近的语境更有助于各国对彼此言行的理解与体会,有学者认为,中、日、韩各国的儒学虽然各具特色,但是“东亚各地儒者都诵读同样的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思考同样或类似的哲学问题,例如《论语》中的重大命题如‘吾道一以贯之’、‘五十而知天命’;《孟子》中的‘四端’、‘暴君放伐’、‘民贵君轻’;《中庸》的‘已发未发’等问题”。由于这些共同的基本问题以不同的方式构筑了各国思想家的讨论架构,因此“东亚儒学”可以视为一个有机的思想系统。^①

总的说来,儒家文化作为东亚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文化,为东亚人提供了重要的心灵归宿,使东亚可以被视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整体。从这个角度看,儒家文化是形成东亚区域意识的文化源泉,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 儒家文化促进区域整合的因素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既可以修身、齐家,还可以治国、平天下。在儒家语境中,家庭、国家和天下是几个不断放大的社会体系,它们性质相同,只是规范不同而已。因此,虽然儒家文化中的许多观点是基于国内政治、人际关系而提出来的,但其中许多观念,例如“和而不同”、“以德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对于处理当今时代国家间关系、推动区域与国际合作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1. 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是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合”是“和”与“合”的复合概念。“和”指的是和睦、和平、和善、和祥、中和等思想;“合”指的是汇合、结合、联合、融合、组合、符合、合作等思想。^② 儒家学说中的和合观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处理国家间关系亦有重要启迪。例如,《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礼之

^① 黄俊杰:《“东亚儒学”如何可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② 邱国勇:《论孔子的“和合”思想及其现代意蕴》,《学术论坛》2006年第10期。

用,和为贵”(学而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篇),这些思想旨在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将它运用到国家间关系中来,国家间也应当以礼相待、和平相处。换言之,和合就能达到和谐,和谐就能达到团结,这对于东亚的区域合作至关重要。区域一体化应当是在多样性基础上的整合,不是搞整齐划一的一元化,如果硬要消除个性,抹杀民族文化,只能带来更大的冲突与灾难。东亚各国应当大力开展各方面的合作,使“合”与“和”相互促进,共建东亚的和谐局面。

2. 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指的是,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即人格理想以及政治理想两者的结合。其中,“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它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并非儒家首创,但其思想内涵却与儒家学说基本吻合。庄子在《天下篇》里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儒家倡导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内圣外王”、“仁政德治”思想的集中表现,因此人们普遍把“内圣外王”视为儒家文化的一大精髓。这其中的“外王”主要是施行仁政,“仁”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倡导仁爱,孟子则将它进一步发展成了“仁政”。孟子在《公孙丑上》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在《尽心下》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矣。”孟子还在仁政的基础上,提出了王道的理想目标,即以仁义政策来治理天下。东亚各国在相互合作中,也应弘扬“仁”、“爱”的精神,遵循优势互补、互通有无、平等互利、诚心诚意、团结互助的原则,进行经济、贸易、文化、科技、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为东亚地区的繁荣而共同努力。那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欺贫的霸道思想和行为,违背了儒家“仁”、“爱”思想的要求,不符合现代道德要求,也不符合东亚地区的整体利益。

3. 天下大同

与世界其他文明产生的各种乌托邦思想一样,儒家也有它的理想信念,即“天下大同”,这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天下的人都亲如兄弟姐妹,应当和睦相处。《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的理想状态里,不是指什么万人归于一统,而是指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

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的理想境界。但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倡导的大同世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它主张“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儒学立足于内在性,而不是外在性,只以自身的理论魅力吸引受众,绝不借用外力、暴力向受众灌输。在儒学传向东亚的历史上,从未发生‘一手拿经书,一手拿利剑’的情形。”^①这一点与近代以来西方动用武力来传播基督福音是不同的。

4. 义利观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义高于利,义主利从,但并不排斥谋取正当利益。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明确以义作为谋利的准则;倘不符合此准则,则“君子固穷”,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去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孔子因此对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评价很高;对安贫乐道的大弟子颜回称赞有加;他自己在陈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②可见,孔子是言行一致的。在义利面前,儒家一再强调:在得到好处的时候,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这些好处、利益是否合乎道义,万不可做那种“惟利是求”、损人利己的事。^③孔子认为,义字当头还是利字当头,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利字当头,争权夺利,必然激化矛盾,积仇积怨,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儒家义利观也适用于处理当今的国家间关系,一个国家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但如果这是以损害他国利益,干损人利己的事情,那就不可取了。东亚各国在一体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侵蚀各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应当处理好各自的国家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避免增加一体化的阻碍因素。

上文仅列举了儒家文化中有利于区域整合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因篇幅所限,难以一一罗列出来。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到儒家文化在倡导国家和睦相处及区域合作等方面的丰富思想。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儒家文化拥有这些丰富的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思想,但国家的对外政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即使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各国也不见得采用其思想主张。因此,我们无法强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一定得按照儒家思想准则行事,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可以更容易理解彼此的外交政策与行为。

① 宋志明:《儒学的内在性与东亚价值观的共识》,《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

② 邵鸿烈:《孔孟义利观新议》,http://www.plcsky.com/html/wh/yi/2012/0823/972.html。

③ 苗润田:《儒学的现代性与东亚文化》,《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

三 儒家文化与区域整合相悖的方面

经过两千多年的洗礼,儒家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代儒者的改进,融入了许多新的时代因素,使之能够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但它毕竟是农耕时代的文化产物,受其影响,东亚许多国家形成的崇尚权威、强调等级秩序与忠君爱国的思想传统,与当今时代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格格不入,也与区域合作的潮流相悖。

1. 强调等级秩序,与现代国际关系理念向左

儒家在家族伦理上带有浓厚的威权色彩与等级观念,对女人、晚辈从来不曾赋予平等的地位,并将治理家族的原则推广到国家乃至天下,这也是儒家文化今天备受诟病之处。三纲五常是儒家伦理文化的主要内容,并经过几代思想家的努力逐渐得以完善。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五常之道”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①三纲五常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尊卑等级,运用于国家间关系,就容易形成不平等的等级结构,与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平等理念格格不入。区域内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大国应当尊重小国,平等相待,消除小国的疑虑,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大国的体量大,代表的人口基数也大,如果在实践中与小国的发言权一样,又显得不公平,很难想象中国与新加坡在区域一体化组织中的发言权与表决权是一样的。因此,区域一体化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兼顾公平。

2. 强调忠君爱国思想,倡导民族主义,不利于区域主义的成长

民族国家是在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构之后出现的,相比之下,东亚民族国家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但爱国主义不是近代才起始的,它具有非常久远

^① 李文静:《论中国传统家族团体及其衰败》,《新疆社科论坛》2011年第2期。

的历史,儒家知识分子始终怀有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例如屈原、文天祥、岳飞等人的忠君爱国事迹传诵至今。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的这种心系天下的社会取向,既烘托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至上性,又为爱国情感的滋生,准备了浓厚的社会心理氛围,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这一心态的生动写照。精忠报国并不仅仅体现于中国历史之中,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例如越南阮朝初期的著名将领阮黄德就是忠君爱国的典范。“忠”是日本儒学最重要的道德,它“对日本人的支配力仍然是不可怀疑的”^①。应该说,东亚各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不是产生于民族国家产生之后,而是汲取了儒家文化的营养,与“忠君”混合在一起,发展壮大起来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一对孪生姐妹,有时候很难分清彼此,它们在东亚各国寻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亦推动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各国经济实力壮大之后,又进一步助推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若民族主义持续高涨,过分强调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忽视区域的整体利益、贬损他国利益,并不利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

3. 强调“面子”,不愿面对错误与耻辱,影响了该地区的历史和解

耻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东亚各国均有体现。儒家强调:“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并把“礼、义、廉、耻”称为四德,当做为人处世的根本。孟子又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他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儒家文化把知耻作为约束人们的手段,鼓励人们做到“仁义礼智信”,如果做不到,违背了道德标准,就要受到外界的指摘。对于道德自律性强的人,可以通过内心的自省来做仁义的事情;而对于道德自律性不强的人,就得通过外在的约束力来迫使其行仁义之事。换言之,儒家文化通过“羞”与“耻”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种文化特性亦体现在中日关系之中。中国人认为日本过去对邻国犯下了侵略罪行,就应该反省、认罪、道歉,当日本人做不到这点时,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民族尊严被冒犯了,遂表现得非常愤怒。对日本人来说,如果将过去所做的事情作为罪恶全部应承下来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于是为了洗清罪恶,就想方设法为过去的所作所为寻找别样的解释,将东亚各国认为的侵略扩张行为,说成是日本帮助它们赶走西方侵略者,将它们从西方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功臣,那么我们日本“何罪之有”?说到底,都是因为面子上过不去,谁也不愿意丢面子。林语堂先生曾深刻地指出,“面子”“无从予以定义”,“它好像是

^①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1页。

荣誉而不是荣誉,它不能用金钱购买却给予男男女女一种实质的光辉”。在中国,“不给人以面子,是不可宽恕的无礼,犹似欧美人的向人挑斗”。^①

结 论

在东亚多元文化格局中,儒家文化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它在向中国周边地区辐射、发展的过程中又结合了各国、各地区自身的特色文化,使之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表现形式又具有一定的差异,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东亚国家文化上的亲缘性,也无法否定各国共同拥有文化遗产的事实。作为影响力最大的一支文化,儒家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东亚共同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东亚地区既有推进区域整合的诉求,也存在领土归属、历史恩怨等方面的争端。儒家文化中诸如和合观、内圣外王、天下大同、义利观等思想观念是促进区域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黏合剂。但也应当看到,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儒家文化中也有一些不利于区域合作的因素,例如等级秩序、忠君爱国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耻感文化等。作为生活在当代的人们,不能对产生于两千年前的古老文化求全责备,而应当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解决今天面临的各种问题,克服困难,化解矛盾,求同存异,齐心协力建设东亚人共同的家园。

The Dual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East Asian Integration

Wang Qiubin^②

Abstract: Culture, especially common culture,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fucian culture is a kind of symbolic culture in East Asia, and is one of the cultural sources of many countries in this area. It also is the cultural basis of East Asian consciousness and an important label which distinguishes East Asia from the West civilization. As the regional common culture basis, Confucian culture is one of important condition to promote East Asian integration. The idea of harmony, trust, containment, ... in Confucian culture has contributed to promote re-

①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190页。

②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 Public Affairs, Jilin University.

g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 being formed over 2000 years ago, Confucian culture also has had element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present time, such as the ideas of hierarchy, royalism and shame, etc. These elements have been somewhat contrary to the common goal of the region in building equality, mutual benefit and mutual trust. Consequently, in the process of East Asian integration, we should exploit Confucian-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avoid unfavorable ones to make it contribute its wisdom to regional integration greatly.

Keywords: Confucianism; East Asia; integration; common culture